



## 黄巢之墓在成都

### 一、黄巢咏菊诗的霸气

今《全唐诗》共收录黄巢诗三首，除《自题像》外，其余二首均咏菊之作。

其一《题菊花》云：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其二《第后赋菊》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以来，尤为偏爱菊花者，可谓黄巢也。然其托物喻志之中，透出一种愤世不公之霸气，则露其反叛思想之端倪矣。黄巢身处唐王朝末期，时政坏赋重，官吏贪腐，民生艰难。《旧唐书·黄巢传》云：“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又《资治通鉴·僖宗乾符二年》亦载：“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事；至五年（878年），王仙芝、尚君长已先后身亡。尚君长之弟尚让，率余众与黄巢聚合，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军转战南北，纵横万里，二三年间形成声势浩大之队伍，并攻占洛阳，随即挥师西进，直奔长安而来。至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三日，黄巢军攻下潼关，兵临华山，朝廷急忙授黄巢“天平节度使”以抚之。黄巢不受，急攻之。十二月五日，僖宗与李室四王及嫔妃数人仓皇出逃，百官莫知，随军仅五百兵士而已。黄巢攻入长安，尤憎官吏与王室贵戚，得者杀之，颇有“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威势。《旧唐

书》同转载：“十三日，贼巢僭位，国号大齐，年称金统。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此谓之符命，意指‘唐’字去下体，仅余‘广’字，移‘黄’字于下，即‘广（广）’字；又日月合为‘明’，故僖宗改元‘广明’，乃应‘黄家日月’之符命也。时‘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巢贼竟投物遣人。’颇有‘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之公平为民思想也。常云‘诗言志’，是以二首咏菊诗系黄巢之作无疑。惟其如此，亦令后之咏菊者多畏而却步也。

### 二、关于黄巢《自题像》诗的争议

对黄巢第三首《自题像》诗，历来争议较大。其题下注云：“陶穀《五代乱离记》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黄巢《自题像》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

关于此诗是否为黄巢之作，早至宋代已有两种观点。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

唐史，中和四年（884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脱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相识，但作南禅寺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邵氏本洛阳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卒于四川犍为县。其早年数往洛阳南禅寺，以为壁间画僧，即巢也。所言之事，又无不与陶穀之记相符，故断定唐史所载黄巢首级乃伪也。此肯定黄巢败后在洛阳出家为僧，《白题诗》亦黄巢所作。

而持否定者，乃南宋赵与时。其《宾退录》云：

陶穀《五代乱记》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栏干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麈录》。殊不知此乃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僧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今《全唐诗》卷四百十一，收有元稹《智度师》二首，诗同上。赵与时卒于绍定四年（1231年），已近南宋末期。其与邵氏间隔七十余年，然对《白题像》一诗系后人拼凑而成之精核辨析，已胜邵氏一筹。是以论史言事者，未必前是后非也。惜赵氏未能对王仲言所说黄巢墓之事，有所辨驳。王仲言《挥麈后录》记载：“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然明州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原本传巢败后在洛阳出家，今王氏一言西京龙门寺有黄巢之塔，又谓浙江雪窦山有其墓，且岁祀至今，言之凿凿，犹似亲历。究竟巢墓在何地，孰真孰伪，王氏亦未有略辨，令人混淆不清矣！尔后亦未见有辨非之说，故千年之下，已成疑案一桩。

### 三、黄巢当系兵败自刎

对《白题像》一诗是否伪作之争，涉及黄巢兵败后的身世去向。赵与时从诗句雷同上作了辨伪分析，但未能就巢败后是亡是逃作明确解答，而此乃真伪之关键也。由于宋人对史传缺乏综合研考，故难从根本点判定是与非。事实上，黄巢十年的起义生涯，以兵败狼虎谷自刎身亡而告结束，既未逃出为僧，亦未作《白题像》诗。

《旧唐书·黄巢传》云：“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同

传谓林言，即黄巢之甥。又《资治通鉴·僖宗中和四年》亦云：“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揆之情理，黄巢外甥林言于此时难以下手。故《通鉴》注引《新传》曰：“巢计蹙，谓林言：‘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是以黄巢兵败，自刎身亡，似合情理。不同之处，即林言是否同遭杀害，两史所载有异。《全唐文拾遗》卷四十收录崔致远《贺杀黄巢表》云：“臣某言。臣得武宁节度使时溥状报，逆贼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泉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崔致远，新罗（在今朝鲜半岛东南）人，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任职，凡表状文翰，皆出其手。此代高骈所作之贺表。而状报者，乃时溥获黄巢首级后通牒各节度使之文。故崔氏文所言，系当时之真实战报。是以林言未被博野军杀，而尚让与黄巢分队列于莱芜县东北地，亦未先降时溥。其降应在巢亡后；各史所记，均有误。至于邵博谓“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未详诸史实，显系自度之言。明乎此，则知黄巢兵败身亡，所谓出家作诗，纯属无稽之谈。

### 四、黄巢墓曾在成都存275年之久

自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打长安，十二月五日僖宗即仓皇出逃，于次年二月至成都，直至黄巢身亡于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僖宗一直驻于成都，长达五年之久。史谓“送行在者”，即送黄巢首级于成都。关于所送行在情况，《通鉴·中和四年》有详细记载：

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哉？”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往昔翻检史籍，偶见《宋史·王刚中传》记载：

# 闻一多： 喝得洋墨水，做得中国人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登上上海轮，越洋赴美。好友梁实秋说他“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如此浓厚的东方情结使他在美国的身分认同常常陷入矛盾与苦痛之中。

在海上时，闻一多就在给梁实秋的信里大吐

苦水，说船上的“城市生活”扰乱了他的思想，让他大失所望。更严重的是，他说：“我的诗兴被他们戕害到几等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龙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底赞叹歌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么？……”对于一个注重东方传统

“葺诸葛武侯祠、张文定公庙，夷黄巢墓，表贤瘵恶，以示民”，顿感惊诧：成都会有黄巢墓？后遂检阅相关资料，始知黄巢兵败狼虎谷，自刎身亡，断无出家为僧作诗之事。所谓浙江雪窦山之黄巢墓，亦纯属无稽之谈。惟成都之黄巢墓，盖函首送行在之遗存矣。

王刚中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四月至成都，制置四川。他在“一葺一毁”中夷平黄巢墓，则知墓距修葺地不远。然修葺地有两处，一为武侯祠，一为张文定公庙。墓地又靠近何处祠庙呢？杨升庵《全蜀艺文志》收录王刚中《张忠定公祠堂记》云：“迄嘉祐己亥（1059年），府帅侍读王公素，始大建祠于府治之东。”王素所建之祠，即张忠定公之祠堂。至王刚中来成都，已百年之久，堂构衰剥，廊庑颓败，故王刚中重加更新。是以张公庙在府城之内，黄巢之墓，当无葬此之理也。按《宋史》记载的“张文定公”有误。张文定公，乃张齐贤，与张忠定公张詠为同朝之人，但无入蜀之仕履。而张詠出镇成都，享誉蜀中，其离蜀后卒。蜀人闻之恸哭罢市，置公画像于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王素入蜀后即为张詠修祠堂，王刚中来此又重加修葺，故有《张忠定公祠堂记》。是以《宋史》误“忠定公”为“文定公”也。

王刚中修葺另一地，即先主武侯祠，而作记者，乃成都新津人任渊。据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辑录任渊《重修先主庙记》云：公“用故事，谒诸祠，奠献至此，顾瞻太息曰：‘成大功德于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庙貌乃尔，亦独何必。’亟命有司缮治之……祠与惠陵皆护以垣墉，限禁樵牧。筑室忠武侯祠北，明洁幽邃，有事于神明者，得以休焉……公名刚中，鄱阳人……绍兴三十年（1160年）记。”武侯祠的修葺，始于绍兴二十九年十月，完工于三十年三月。原武侯祠庙在刘备大殿西偏少南，新筑休息之室已在武侯祠北面。今日武侯庙在刘备殿后，乃此后变故也。

由于黄巢墓不可能位于府城之内，则极可能就在武侯庙附近。南宋时常有樵牧之人出入，唐代时更可能荒冢丛生。何况僖宗又在罗城正南门大玄楼接受献首，宣问姬妾。既戮之于市，理应葬于城南郊野之地。故王刚中以“贤恶共处，无益教化”为由，在重修昭烈武侯庙以彰贤时，即毁夷黄巢之墓以瘵恶示民，并利用其地建室以供有事神明者休焉。揆之方位，应在今南郊公园内。自黄巢兵败狼虎谷，自刎身亡，其无头尸即弃之荒野，恐难有人为其筑墓莹。故成都之黄巢首级墓，系其惟一之墓葬，惜仅存275年而已。